

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



茅家琦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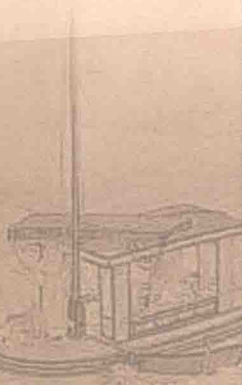
李兆洛評傳

邱新立 著

先生和先國子久不相聞想念為勞
膝帶
序為頌滿年來日就衰邁惟風
雨版濫斯夕自怡遂忘其傍素荷
卿以奉慰懇者門下士吳若野俞勳之四
先生道意蒙刻富生畢具款事
艱朽李嘉仰

斜陽嫩碧天一春今
賴看山歸士何忘
西廊第几間

常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人民出版社



李兆洛評傳

邱新立 著

常州大字圖書館
藏書章

常州清代文化研究叢書



茅家琦 主編
陳吉龍 副主編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 江蘇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兆洛评传/邱新立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8

(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214-05537-8

I. ①李… II. ①邱… III. ①李兆洛(1769~1841) — 评传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9427 号

- 书 名 李兆洛评传
作 者 邱新立
出版统筹 曹 斌 许文菲
责任编辑 戴同华
装帧设计 陈 恣 许文菲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 1 304 毫米 1/32
总 印 张 65
印 数 2 000 册
总 字 数 1 2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537-8
总 定 价 250.00 元(共 5 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绪言

——“世运潜移”与学术丕变	1
第一章 家世和功名之路	11
第一节 “代为素门”	12
第二节 “江南名解元”	19
第二章 “繁昔壮盛年，叨为下蔡长”	29
第一节 “地利宜讲求”	30
第二节 “保甲宜举行”	40
第三节 “读书宜鼓舞”	52
第三章 “东南讲席，惟先生一人而已”	62
第一节 客授四方	63
第二节 暨阳书院	69
第三节 经是人师	79
第四章 “十年足迹遍扬粤，一时侨胥皆论交”	
——李兆洛的学术交游	99
第一节 学术导师	100
第二节 同车图	114

第三节 经世派	124
第五章 “一代通儒,一人而已”	145
第一节 通儒	146
第二节 会通	172
第三节 经世	193
第六章 “以梓人自随”	212
第一节 “于乡邦文献意甚拳拳”	213
第二节 “不能纪远,乃纪于近”	228
第三节 文献学思想	241
第七章 “志书宜纂修”	
——李兆洛的方志学成就	255
第一节 清代咸丰以前修志概况	255
第二节 修志实践	263
第三节 《凤台县志》	278
第四节 方志学思想	299
第八章 “历算、舆地两业尤深博无穷”	
——李兆洛的舆地、天算学成就	313
第一节 “尤究心舆地沿革”	314
第二节 舆图学成就	327
第三节 天算学成就	340
第九章 “怀独是之见”	
——李兆洛的文学成就	353

第一节 文学创作实绩	354
第二节 《骈体文钞》	375
第三节 文学观	393
余论	
——乾嘉转变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	409
李兆洛年表	432
主要参考文献	440
后记	445

绪 言

——“世运潜移”与学术丕变

乾隆、嘉庆迄于道光朝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之所以能够成为学术主流,因之而在学术史上有乾嘉学派之谓,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其间,既有经济、社会、政治诸方面的深刻制约,也有学术、文化等后先相承的内在逻辑。而在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之下,由帝王好尚所反映的朝廷文化政策,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① 因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究竟怎样发展、朝什么方向发展及其内容和特点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时期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政治文化政策。

清代嘉庆朝以前对汉族士人的政策(主要指文化政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是利用政策;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是高压政策;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是怀柔政策;^②而雍正、乾隆时期又转为严厉控制思想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频频发动的文字狱,几乎给雍乾时期每一个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造成了异常痛楚的时代创伤。清廷对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粗暴践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压统治,确实限制了18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③ 在统治者的高压政策和诱导下,学术窒息,思想禁锢,人才摧残,当时学者的学术研究只能走向脱离实际,埋头书斋,稽古而不问政事的落后方向。

乾隆末年以后,清王朝由盛转衰,“乾隆盛世”已成明日黄花,整个社会呈现出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衰世景象。王朝的政治、经济、军

① 参见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②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8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③ 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0~51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事力量衰弱,已无力像从前那样,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垄断学术了。国势的江河日下,也给士子们很大震动,学者们再也不可能“镇日书帙校勘劳”了,一些思想较为清醒、敏锐的官僚和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开始觉醒。他们纷纷从古籍考证和玄学思辨中抬起头来,把眼光转向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转向中国人十分陌生的、色彩斑斓的外部世界。与此同时,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清初以来对汉族知识分子所采取的严酷的思想控制高压政策在进入嘉庆年间后有所缓和,统治阶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为松弛,士大夫相率钳口结舌,不敢稍议时政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嘉庆四年(1799)八月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致成亲王永理《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极陈时事”这一“违例”上书事件的前前后后,就透露了中国政治气候发生变化的重要信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①,思想学术界渐趋活跃,许多以前绝不能议论的敏感问题,尤其是现实社会问题,得以日益公开地展开讨论,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敢于放言纵论。这与雍乾以来“有思想才能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于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②的情况大相径庭。在政治与学术的双向抉择与彼此的互动中,学术乃随世运而转移。以空前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为根据,自康熙中叶以后沉寂多年的经世思潮勃然崛起,蔚为风气;汉宋学之争趋向调和;讲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再度复兴,在鸦片战争前后趋于高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序幕,中国社会逐渐步入近代。^③

一、汉宋调和

乾嘉时期的学术主流是汉学(或曰考据学、考证学、朴学)。所谓“汉学”,是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条例以治群书”^④,即回溯或尊崇汉代的经学及研究方法,不空谈义理,学主实证,强调每立一说,必多方取证,把可以据信的结论笔之于书。此种学风,起源于清初顾炎武所倡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64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②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三编第八章《康乾诸帝之于文化》,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705页。

③ 参见冯天瑜、黄长义:《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3、46~122页;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69页。

④ 刘师培:《左庵外集》卷九《近代汉学变迁论》,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41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导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的治学方法论，流行于乾、嘉两朝，尤以乾隆中期为其鼎盛期。所以，“汉学”又往往被称为“乾嘉汉学”。乾嘉汉学按其流派，主要可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派起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主张搜集汉代经师注解，加以疏通，以阐明经书大义；该派特点是好博而尊闻，以信古为标志，崇信汉儒。皖派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主张从音韵、训诂、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中的大义和哲理；该派特点是重精审，贵创造。两派风格虽不尽一致，但彼此影响，互为师友，“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②，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密的考据方法。在他们看来，“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③。吴、皖学者的研究重心是校勘、考订、注释儒经，而其解经、注经多推重或归依于东汉经学，推崇许慎、郑玄之学，一时形成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局面。

随着汉学崛起，经史考据蔚成风气，学术界遂成一“汉学专制”之局^④。其时学者群趋考据一途，从事于考文、审音、校勘、注释、证说、名物等具体工作，搜集整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古籍文献，在最终结束宋明理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地位，系统整理和保存古文献，完善考据学方法，以及开创实证学风诸方面成就巨大^⑤。但汉学家过分夸大了文字与义理的关系，将训诂、考证看成是探求义理的唯一路径，而忽视了“义理有时实在语言文字之外”，往往抱小遗大，流于琐碎，一字聚讼，动辄数千言，以致“毕世治经无一言几于道，无一念及于用”（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失掉了17世纪学术思想界弘伟活泼的气象；加之株守汉儒、泥古盲从，谈不上个性的发展和见解的创辟，领域渐趋狭窄，汉学本身积弊渐显，学术病痛日深，因此早在乾

①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载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华忱之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2版，2008年第3次印刷，第73页。以下引《亭林文集》、《亭林余集》、《亭林诗集》，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250页。

③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页。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64页。

⑤ 杨东莼论朴学的贡献，曾言：“其他如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刊，伪书的辨明，佚书的搜辑，以及古书的校勘，都是这些经师的最大业绩，而很有益于后学。”（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隆中后期汉学正炙手可热之时,一些有识见的学者就对汉学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态度日渐不满。嘉道时期,国家多故,世变日亟,伴随“世运潜移”,中国学术思潮乃随之而移易。以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结撰为标志,汉学已然日过中天,趋向批判和总结;而与之同时,宋学的颀颀则日渐强劲。

所谓“宋学”,主要是指程朱理学。清朝沿袭明制,将尊孔读经、崇儒重道列为国策,尊崇程朱之学为正统,科举考试“一宗朱子”。然而经过明末清初思想家们对王学末流的批判之后,知识界已很难再建立起对理学的虔诚信念。尽管康熙时期统治者转而宗法弊端稍轻的程朱,理学盛行^①;乾隆皇帝也宏奖理学,尊崇朱子,乃至整个有清一代,宋学一直高踞庙堂,理学始终是官方认可的“正学”,但陈腐的理学已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乾隆年间,随着汉学迅速扩张,并得到朝廷的肯定和提倡,宋学几不成军,日渐衰飒凋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汉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风气既成,要想扭转它,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朱子学的传衍并未因乾隆皇帝之提倡而获推动,“治宋学者已鲜”^②。宋学仅仅成为士子们科举入仕的敲门砖,一旦成功即弃之而转治他学。故章太炎在清末总结清代学术史时指出:“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③

清代汉学是在同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新学风与反理学思潮成功结合的产物,是宋学的反动。但就像陆王之学在清初知识界成为明朝败亡的替罪羊一样,在清朝统治危机日趋严重的中衰之世,考据学在取代所谓“空疏”的宋明理学之后,自身也成为众矢之的。过去,实学学风被用来反对理学,现在又被用来批判考证学本身。昔日盛极一时的汉学,逐渐成为一些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被认为是应当为清朝衰落承担责任的“乱经”、“叛道”学问。如宋学家从儒家的德治主义传统出发,把清王

① 嘉道时昭桂反观康熙时的历史,曾言其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者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昭桂:《嘯亭杂录》卷一《崇理学》,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十《经学复盛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250页。

③ 章炳麟:《检论》卷四《清儒》,载章炳麟:《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3页。

朝衰败的根本症结归因为“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认为排斥程朱理学的乾嘉汉学应对此负责。于是，汉宋之争甚嚣尘上。

清代汉学与宋学的纠纷与融合，贯穿清学史始终，但两者分歧的端倪始于清初。乾隆年间，汉学大行，汉、宋对峙渐成格局。无论是治学方法还是价值取向，汉、宋两种学统均呈对峙态势。但随着汉学末流的烦琐学风走向极弊，其崇汉、佞古、狭隘、繁琐、据守、门户之见、脱离实际等弊端暴露无遗。宋学营垒中人目击其弊，乃不泛起而诋斥其病痛者，嘉道之际，宋学开始呈现出复兴态势（并不是康熙年间理学的简单兴复）。翁方纲、姚鼐、方东树、李元春、潘德舆、管同、唐鉴、倭仁、夏炯、李棠阶、吴廷栋等人，重整程朱理学的旗鼓，向汉学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汉宋学术之争，形同水火。而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尊汉尊宋，互相攻讦，即可视为当时汉、宋冲突的象征。

汉、宋二学虽然分野明显，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守六籍以言道”，皆以儒家六经为依归，故两种学统在相互对峙、排斥的同时，又存在调和的一面，后者在嘉庆以降更为彰显。他们或者认为，汉学、宋学“皆有功于圣人”，皆通“圣人之道”，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或者模糊二者畛域，认为汉儒也讲义理，宋儒也讲训诂名物，其归结都在于能有所用于世，汉、宋学术壁垒，逐渐被摧破。于是，一直在知识界酝酿、作用的经世思潮，乃急剧高涨起来，并被赋予了主张变革的新的时代内涵，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再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以今文经学复兴为代表的经世变革之风^①。

二、今文经学复兴

嘉道之际，针对国势渐渐衰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复杂尖锐的社会现实，有人感到当时学风有改变的必要，于是今文经学异军突起。庄存与、刘逢禄揭橥于前，龚自珍、魏源光大于后，予晚清思想学术以极大影响。

“今文”、“古文”，本是儒家经籍的不同统绪；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同为传习儒家经典，是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深远的两大学派。经今、

^① 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第318页。

古文名称的对立,始于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两者的争论,不单是文字、来源、篇章的不同,而且牵涉到经书文字的训诂和内容的解释、经书中的中心人物——孔子的评价,以至治经宗旨等一系列问题。概括地说,今文经学派(汉代的或清代的)以孔子为政治家(“素王”),六经皆孔子所作,为孔子垂教万世的“致治之术”,故侧重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每每援经议政,“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①,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怪诞;古文经学派(汉代的或清代的)以孔子为史学家(“先师”),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故说解偏重于名物训诂,分析经典文义,内容充实,学风比较朴实,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②

自东汉末年郑玄遍注儒家经典,古文学派盛行,而以公羊学为主干的今文学几乎湮灭殆尽,历经千余年消沉无闻,“西汉所谓十四博士者,其学说皆亡,仅存者惟《春秋公羊传》之何(休)注而已”^③。故汉学的遗产,古文经传多,今文经传少,乾嘉汉学尊崇的实际上是后起的古文学。

今文经学经历一千多年衰微之后,到清代嘉、道年间能够再度复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④。首先,它是古文学日过中天之后,学术反思和调整的产物,是在士人寻求义理的需要中应运而兴的,适应了宋学没落、汉学凋敝新形势下,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演变对学术转向提出的要求。嘉道年间,随着汉、宋由对峙逐渐走向调和融合,一些学者为了弥补乾嘉汉学的义理缺陷,开始汲取宋学,或者从今文经学寻找义理资源。比东汉古文学更古的西汉今文经学,契合了以求真和崇古为理念的汉学家寻求义理的需要,一批有识之士乃借复古的名义,推崇西汉的今文经学,反对后来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古文学。

其次,时局的艰难,民族的命运,要求打破现状,革除积弊,认识亘古未有的变局,这就需要能够阐释变易、变革的哲学,需要新的思想统治方式,一些人便转向了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侧重于探索儒家经典本身蕴含的微

① 何休:《公羊经传解诂序》,《四部备要》本。

② 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2000年,第19~20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6页。

④ 参见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93、124~125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言大义,每每以时事说经义,以经义服务于时政。儒家经典中擅长于讲微言大义的是《春秋》,又特别是《春秋》三传中的《公羊传》。今文学派依据的主要典籍就是这两部书,以及董仲舒《春秋繁露》、何休《公羊解诂》,后两者是汉代注释《春秋》及《春秋公羊传》,发挥微言大意的代表作。今文经学家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变革,以为讲求微言大义,才能经世致用,救国家之急。于是今文经学不仅成为汉学更新、发展的重要途径,适应了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需要,而且今文公羊学说经过龚自珍、魏源等进步思想家的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唤起人们危机意识的武器,达到了他们利用学术形态的思想建设干预现实政治的目的。今文经学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代的新信仰。适应时代需要,自鸦片战争前夕至清末,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风靡于世。

一般认为,清代第一个复兴今文经学的人是与戴震同时代的庄存与。庄氏首治今文经学之《公羊春秋》,所撰《春秋正辞》一书,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他传学于其侄庄述祖,述祖又传之于外甥刘逢禄与宋翔凤。刘逢禄和宋翔凤继承庄氏之学而加以发扬光大,而使今文经学自成一派。因庄存与和刘逢禄都是江苏常州人,故被称为“常州学派”。又因今文经学之中心在《春秋公羊传》,故又被人称为“公羊学派”。常州学派治经不拘汉学、宋学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在方法上,他们不重视名物训诂,反对汉学家的烦琐考证,而专究经文的“微言大义”,从中寻求解脱社会危机的出路,借助其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阐发改良政治的思想。这在当时宋学空疏、汉学泥古的情况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以庄、刘为代表的常州学者,还未达到政治革命的高度,也还未完全理解社会进步的程度。他们发掘的“微言大义”重在彰显王权的理论依据,寻找维护现有秩序的良方。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申述、完善西汉经师及何休的观点,并未超越汉学范畴。^①到了19世纪,刘逢禄将今文经学传给龚自珍和魏源。龚、魏遂以今文经学为理论依据,在“三世”、“三统”说中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提出“变功令”、“更法”等主张,抨击封建制度的腐败,今文经学就被运用

^① 参见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226、210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于政治参与意识和变革思潮。后来康有为、梁启超又利用“托古改制”学说,推演、阐发公羊“三世说”,将之与《礼运篇》的小康、大同思想相糅合,并与学习西方国家学说和民主思想相贯通,提出了一套改变中国封建专制政体、经由君主立宪到最终实现民主政治的学说,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根据,公羊学说在晚清的传播随之达到高潮。

今文经学兴起,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尤多启迪,是旨在变革的经世思潮复兴的哲学基础,常被当作经世之学的理论外壳。一些学者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给知识分子提供了抨时议政的合法的思想武器,从而成为近代学风的先声。

三、经世之学兴起

经世致用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精髓,所蕴涵的高度的社会现实感和实用精神,是挽救社会危机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动力。秦汉以后,这种思想经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等人进一步发挥,日趋明确。南宋以降,“经世致用”的观念慢慢淡薄了。它形成成为一种时代思潮,是在明、清两朝,经历了兴起——沉寂——复兴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兴起,乾隆、嘉庆时期沉寂,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复兴。

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动,满族人主中原统治汉族的严酷现实,创巨痛深,刺激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于亡国隐痛之中,对导致“天崩地解”、“天下陆沉”的原因,披肝沥胆,做深切的自我反思。于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许多反对理学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启蒙思潮。其时,无论是激进思想家还是正统的理学家,无论是学宗程朱,抑或是左袒陆王的,无不力惩宋学末流空谈心性之弊,学术研究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即所谓经世致用。士人的学风由空虚转向笃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治学皆以博大为特色,而归一于经世致用,做到了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和谐统一。尤其是顾炎武,他注重经史,将读书与抗清联结,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是清代古文经学的开创者,被考据学者奉为不祧之宗。但是,康熙中期以后,继顾氏而起的经学家,继承和发展了他开创的朴实考证的治学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自髫龄以至皓首,两耳不闻天下事,将大部分精力投在经学方面,特别是以古文经传

为研究对象,孜孜不倦,却放弃了他“读书”的本意,聋于世而盲于时,囿于古而蔽于今,抛弃了“当世之务”的目标,以顾、黄为代表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主旨遭到忽视,独将博学风气加以发展。因为谈论“经世”,就免不了要涉及时政,开口便触忌讳,遂使人人皆深具戒心。广大知识分子被迫脱离实际,逃避现实,埋首故纸堆,皓首穷经,从事繁琐的考证工作。乾隆年间,“学而优则仕”者因职业关系而关注社会事务,一些宋学家仍具有经世关怀,但从主流看,当时的学术研究多与国计民生无关。个别学者如汪中、章学诚主张学术应经世致用,却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和认同,经世之风不绝如缕。^①

嘉、道以降,清代社会百弊丛生,国势退落,“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②。在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为维护处于崩溃的清朝统治,敏感忧时者批评汉学末流烦琐、陈腐的学风,力求通经明道,复兴儒学的多重传统。加之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统治阶级的思想控制和专制也有所松弛,这些都给经世致用思潮的再兴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社会和学术环境,因乾嘉汉学兴起而久已“隐而不彰”的经世之学乃勃然再兴。一时学术界发出的拯颓救弊呐喊,恢复、倡导经世致用的言行,与时俱增。自管同《永命篇》倡言改革,经包世臣著《说储》主张废八股、开言路、汰冗言,具体拟议改制方案,到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的形成,南北呼应,不谋而合,发展至道、咸年间,经世学风终于从涓涓细流汇集为滔滔巨川,成为一股气势磅礴的时代思潮——经世思潮。其显著标识,便是道咸经世派的形成与崛起;而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选《皇朝经世文编》,则把经世意识提升到学术的高度,是经世致用思潮复兴的象征。

道咸经世派的成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经世思想的督抚大吏或朝臣,如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云贵总督贺长龄、署闽浙总督徐继畲、鸿胪寺卿黄爵滋等。这些人都是进士出身,点翰林,授编修,然后或经御史科道,或历知县知府,由臬司、藩司而巡抚、总督,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或朝臣。他们勇于任事,主张改革,对清除积弊,解决社会难

① 参见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第23~25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4页。

题,多所建言,是一批治世能臣,在当时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巨大。一类是一些沉抑下僚或退而不仕的饱学之士和失意文人,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李兆洛、周济、徐松、汤鹏、沈垌、张穆、何秋涛、张际亮等。这些人多少都与陶、林、贺等官员关系密切,或为师友,或为幕宾。他们或科举屡挫,官职卑微;或仕途坎坷,屡遭打击;或科举无望,布衣一生。但他们震惊于当时潜滋暗长的社会危机,身在江湖,心忧庙堂,为挽大厦之将倾而奔走呼号。他们关心时局,研究大政,熟悉朝章国故,由于长期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对社会积弊多有了解,故讲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学,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声应气求,互相砥砺,彼此呼应,显示出非常重要的群体效应,从而在清朝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提出了不少具体的社会改革主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①:一是重视人才培养;二是关注民生,主张均平财富;三是关注边疆问题;四是关心“夷务”。这些问题涉及改革国家机构、整顿吏治、刷新盐务漕政,等等。他们坐言起行,既是经世思潮的倡导者,又是经世群体中颇有影响的中坚人物。其中尤以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的影响最大,堪称代表。他们从学理层面探讨除弊兴利的途径,注重将学术与治事融为一体,客观上趋向于求真与致用的统一,从而扭转了士林风气,推动了嘉道年间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学术转变,影响了直至清末民初的几代知识分子。

乾隆中叶至道光时期的数十年间,汉学由盛而衰,宋学有所抬头,今文经学复兴,经世之学蔚起。江南通儒李兆洛生活在这样一个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剧变、传统学术开始向近代发展的历史关头,以“疏通知远,不囿小近,不趋声气”^②之态度,以“通经致用”、“求其会通”为表征,自觉地融入复兴西汉今文经学、开启近代变革思想的时代潮流,表现了较强的经世意识。他的一生,几与此一历史时期相终始,不啻为其时学术演进的一个缩影。

^① 参见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第571~576页。

^②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载魏源:《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版,第359页。以下引此书,皆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以下引此文,简称“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不再一一注明。

第一章 家世和功名之路

李兆洛，字绅琦，更字申耆，“尝颜其室曰养一，晚因号养一老人，学者称养一先生”^①，门弟子群称养一子。清江苏常州府阳湖县大宁乡三河里（今江苏武进市东三河口乡）人。生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九月二十四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享年73岁。

李兆洛的一生，以经历为主线，约略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40岁出任凤台知县以前，为第一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一面应付科举考试，一面钻研学问，其生活内容几与应举有关，而其学术倾向亦基本定型，并以出众的才华，成为常州一位佼佼出众的学者与淳正的古文家。为官凤台为第二时期。在这一阶段，他投身于吏治实践，忠于职守，勤求治理。去官后直至去世，为第三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先随康绍镛游幕南北，倦游归来，选定江阴暨阳书院为后半生的落脚点，专心一意读书、写作、讲学，思想日趋成熟，学问不断增长，博览淹贯，巍然大师，被姚莹尊为“东南讲席，先生一人而已”^②。

李兆洛平生著述宏富，其荦荦大者，“所辑有《皇朝文典》七十卷、《大清一统舆地全图》、《凤台县志》十二卷、《地理韵编》二十一卷、《骈体文钞》七十一卷、《旧言集》初编、次编、广编，所著有《养一斋文集》二十卷”^③。这

① 薛子衡：《养一李先生行状》，载《养一斋文集》卷首。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4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活字印、二十四年增修本影印，第270页。本书凡引续修四库全书本者，均据此版；引《养一斋文集》、《养一斋文集续编》和《养一斋诗集》，凡未注明版本者，均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② 蒋彤：《养一子述》，载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卷七十三《儒学三》，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19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以下引此文，均据此本，简称“《养一子述》”，不再一一注明。

③ 清国史馆原编：《清史列传》卷七十三《文苑传四·李兆洛传》，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0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16页。以下引此书，均据此版，不再一一注明。

